

黄振南 著

独秀论丛

中法战争管窥

中国文史出版社

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学科

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独。秀。论。丛

黄振南 著

中法战争管窥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法战争管窥 / 黄振南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2
(独秀论丛)

ISBN 7-5034-1622-X

I. 中… II. 黄… III. 中法战争 (1883~1885) —研究
IV. K256.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9055 号

中法战争管窥

黄振南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印 刷: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 邮编: 541001

装 订: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 邮编: 541001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80 mm×1240 mm 1/32

印 张: 16.25 字数: 452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定价: 17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但愿独秀花常开

——“独秀论丛”序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具有悠久的历史。从 20 世纪 30 年代至今，虽然其归属的院校多有变更，但 70 多年来一脉相承，从未间断。1953 年院系调整，学校从桂林南郊赤土堡迁入王城，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了。

王城位于桂林市中心。它建于明朝洪武初年，城中有独秀峰。从南朝刘宋颜延之出任始安郡太守开始，独秀峰下这块宝地就逐步成为桂林乃至广西的政治文化中心。历代郡、州、府治之外，明代的靖江王府，1921 年孙中山北伐的大元帅府，直至新桂系的广西省政府，也都设在这里。独秀峰东南麓的天然石室，是颜延之读书为文的地方，后人名其地为“读书岩”。而独秀峰“嘉名之得”，实肇始于他的“未若独秀者，峨峨郭邑间”的诗作名句。唐代李昌巖任桂管观察使兼御史中丞，在独秀峰南麓建立宣尼庙，开办桂林第一所府学。从此以后，桂林的文化教育事业代有发展。清代，王城为乡试取士的贡院。1910 年，广西图书馆创建于王城东南隅。1953 年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在王城办学，历史系就是它的重点系（科）之一。1500 多年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发展，今日的王城，成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之一。

如今的广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历史系，继承昔日历史系教学与科研并重，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书斋苦读和社会实践同步进行的传

统，既培养了建设人才，又做出了科研成果。现在，几位中青年教师在院、系的支持下，决定把他们多年辛勤研究的成果，汇集为“独秀论丛”公开出版。这些成果，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他们在独秀峰下的辛勤劳动。刘小林教授的《思潮·观念·范式——20世纪前后的文化思索》，围绕中西文化观、社会思潮、民族文化范式等探讨世纪之交中国文化的嬗变；周建明副教授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中德贸易》，对近代中国与德国贸易的趋势、地位、商品结构等进行研究；黄振南教授的《中法战争管窥》，以国人罕见的法国原始档案等去证实中法战争的许多具体问题；谭肇毅教授的《桂系史探研》，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分析桂系军事集团治理广西及其与蒋介石的明争暗斗；刘道超副教授等的《周易与中国民俗》，以易学易理阐述民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源；廖杨博士的《港澳台族群社会与文化研究》，以历史人类学方法探讨港澳台地区国内外族群杂处的族际社会和族群文化。各书内容相殊，互不统属，自具一格，不正是我们常说的“一花独秀”吗？如果说这6本书是这套“论丛”的起步，那么，继之而来的将是百花齐放的春天，把王城这个花园装扮得更加靓丽。

我年过八旬，希望在于来者。愿广西师范大学人才辈出，独秀峰下鲜花常开，八桂史坛硕果累累。

是为序。

钟文典

2005年1月25日

写于桂林王城独秀峰下

目 录

但愿独秀花常开——“独秀论丛”序钟文典 1

第一辑 杂言琐事钩沉.....1

1. 中法战争前夕滇边通商之争.....3
2. 中法交兵前战和之争的缘起与发展.....17
3. 中法战争前夕保越与弃越之争.....33
4. 石浦事件述略.....48
5. 略论中法战争期间法国的大米禁运政策.....63
6. 浅述法国大米禁运政策的出笼.....79

第二辑 疆场风云蠡测.....91

1. 山西之役始末.....93
2. 山西之役起因与败因初探.....105
3. 首次基隆之役考.....132
4. 关于淡水之役的几个问题.....164
5. 镇海之役真相及意义192

第三辑 北宁战火稽考.....219

1. 北宁之役史料概说.....221
2. 简述北宁之役爆发的背景.....235
3. 北宁战前清军备战内幕.....246
4. 北宁战前守军布防探微.....259
5. 北宁之役中清军将领之劣迹.....275
6. 清军北宁惨败原因初探.....288

第四辑 浅尝辄否评鹭.....299

1. 试论刘永福在北宁之役中的表现.....301
2. 刘铭传撤师基隆之我见.....318
3. 李秉衡旅桂行迹.....329
4. 中法战争后期李秉衡督办后路军事浅议.....352
5. 试论中法战争时期张之洞的战守方略.....367
6. 《中法新约》签订前巴德诺的伎俩.....385

第五辑 译译瞻顾试笔.....399

1. 法越关系的缘起.....401
2. 何罗栳、孤拔、波滑三头政治.....411
3. 法军攻占澎湖与孤拔之死.....438
4. 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回顾.....443
5. 20世纪中法战争史研究回顾与前瞻.....453
6. 中法战争史研究百年回眸.....471

后 记.....511

第一辑

杂言琐事钩沉



中法战争前夕滇边通商之争

中法战争爆发前，西方列强曾把注意力投向中国西南部，企图在云南开通商埠，以便倾销商品，加紧对华的经济侵略。面对列强的要求、威胁，清朝内部意见极不一致，一部分人主张开放云南，另一部分人则主张继续关锁滇边，他们各抒己见，论争热烈，认识莫衷一是。深入探讨这场论争的背景、内容及其特点，对于了解战前中国的社会思潮和政治形势，颇有裨益。

一、论争的由来

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攫取了在中国沿海沿江城市通商的利益，还企图从已占领的缅甸开辟陆上商道，进入云南，并欲吞并这块宝地。在伦敦出版的地图中，竟荒唐、无耻地将云南“划成一个完全和中国隔离的王国，并名之为 *Panthays* 王国”。^[1] 震惊一时局的“马嘉理

[1] 邵循正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下称《中法战争资料》）册1，页413。

案”的发生，就是英国欲在中国西南开拓商业市场的产物。经过一年多的交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远远超过马嘉理事件本身的《烟台条约》，增辟湖北宜昌等4个通商口岸和安徽大通等6个泊船码头，扩大了英国的在华特权，并为英国入侵云南开辟了道路。

为了与英国在亚洲所占印度、缅甸保持势力均衡，法国则以越南作为军事基地，声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2]为此，法国侵略者的先遣队四出活动，从安邨（Garnier, Marie Joseph François）、特拉格来（de Lagrée, Doudart）到堵布益（Dupuis, Jean），无不千方百计寻找通滇之路，终于发现了红江是从越南进入云南的最佳路线。于是他们执着研究这条商道，“并且坚持地追求其实现”。^[3]

为了不让英国在中国西南独自获利，“马嘉理案”一发生，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Rochechouart, Louis Jules Emilien）就迫不及待地向迪卡兹（Decazes）公爵表示，如果中国在八莫一路给英国予权利，必须同样在红河一路让给法国予权利。^[4]并照会总署，要求清政府“于和约详载通商各口外，另添一口在云南省自阳江面至蒙化（自？）地方。”^[5]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法国继续派人到总署纠缠，无理命令总署给罗淑亚立一文书，保证中国若准许英国由缅甸在云南陆路通商，即许法国由阳江口在云南开水路通商口子。总署仍未应允。

英国通过解决“马嘉理案”获得在云南腾越通商权后，法国步其后尘，不甘落后。光绪五年（1879），到越南为法国殖民者开路的兰德（Raindre）向其主子报告：“云南省的开放，对于东京各海港将作为一种不可估量的发展；它将使中国商业的一重要部分转向这些商业

[2]〔越〕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中译本，卷1，页41。

[3]《中法战争资料》册1，页408。

[4]〔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卷2，页382。

[5]郭廷以等编：《中法越南交涉档》册1，页25。

地区来。”^[6] 这个报告明确道出了法、英角逐中国西南的原因所在，它对法国政府坚定打通云南的决心起到了摇唇鼓舌的作用。翌年，法国报刊进一步鼓吹，掌握红江出海口及下游，可“在华南富足的市场上建立优势”。^[7] 这种鼓动性宣传一直延续，中法战争爆发后，巴黎的战争贩子们还叫嚣通过扩大战争进入云南；法军攻下北宁后，这些人得意忘形，他们向内阁总理兼外长茹费理（Jules Ferry）煽动：英国已在云南得到好处，作为战胜国的法国难道会得到更差的待遇吗？^[8] 可见当时法国舆论界是多么想把云南划进法国的势力范围。

法国人的行动，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1882年，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Wade, Thomas Francis）敏感地预言：中国将遇到“一个非常好动的邻国，它公然的目标就是越过南方边界强迫通商。”^[9] 被越南国王授予官爵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致函云贵总督刘长佑，询问云贵督、抚大宪是否同意法人上通云、贵二省。^[10] 越南礼部侍郎陈叔切则向前去探听形势的马复贲请求清朝拒绝法人入滇，冀望中国成为越南的后盾，使越南“仰赖安宁”。^[11]

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朝内部终于掀起了一场是否允许法人入滇通商的争论。

[6] 《中法战争资料》册1，页472。

[7] 《法兰西共和国报》1880年6月29日文，见法国外交部档案《回忆录与公文·亚洲》卷36。

[8] 1884年3月15日法国众议会致茹费理函，见法国外交部档案《回忆录与公文·亚洲》卷43。

[9] [英]季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中译本，页91。

[10] 《中法越南交涉档》册1，页453。

[11] 《中法越南交涉档》册1，页445。

二、双方理由及议而未决探因

在滇边是否应该开放的论争中，清朝群臣自然地形成同意和反对两种不同的观点（下分别称他们为“开放派”和“反对派”），他们各不相让。这一争论与渐次兴起的对法战和之争相互交织，构成了中法战争前夕清朝内部的大论战。

1. 开放派及其观点

开放派的对外开放思想提出较早，光绪九年（1883）初达到高峰，标志是驻英、法、俄国使臣曾纪泽提出开放红江以及群臣就此问题展开的讨论。曾纪泽的建议得到了总署的支持，总署认为：“与其由法据越议将红江与各国通商，似不如由我先许各国通商。”^[12]按总署之意，开放红江是有限的，“但可允通滇，勿许入滇境。”^[13]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在“核议”曾纪泽这一设想时虽执反对态度，但就这场论争来看，李鸿章正是开放派的健将之一。长期在北洋幕府为李鸿章办理文案的薛福成、中国的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也主张开放滇边，同法人分享商利。云南方面，主张敞开大门的则是云南布政使唐炯。

这些人当中，有的希望中国主动开放滇边，以作为对付法国的策略或富我之道；有的建议被动地开放，以满足法国的要求而维系中法关系；有的则认为云南没有通商条件，纵使开放，法国的商业势力也无法进入滇疆。就其开放滇边的目的而言，固然有不尽相同之处，但就达到各自目的的途径而言，却是相同的。

归纳他们提出的开放理由，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2]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3，页29。

[13] 《中法战争资料》册5，页76。

第一，通商云南于我有利无害

从历史上看，“自古经国之计，当务招徕商贾，无以闭关绝市为义者。”^[14]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相继在沿海及长江沿岸开放了 10 多个通商口岸，在云南，腾越等处已向英国开放，何惜蒙自一口？多向法国开放蒙自一口，只能多收一口之利，实为有利于国，无害于民。况且，云南是边地通商之始，中国主动开放，就与此前被迫开放的沿海沿江通商口岸不同，即可仿美国与朝鲜所立之约，议一最公允的规条，以昭友谊。这样，不仅可使续议之约有例可援，而且可以隐为挽回已立条约之失，有裨全局。为此，中国应借助法人之力歼除占据明山的李昭胜，“与法人共有明江，以收富良江之利。”^[15]

第二，开放红江是对付法国行之有效的办法

红江是滇越通商要道，若由我主动向各国开放，“实为御法之良策”。因为这样做可使西洋各国知道中越藩属关系未断，“可省无数窥伺之心”。^[16] 各国既能入滇通商，即可起到牵制法国，“孤法之党”，“益我之援”的作用。^[17]

第三，云南地瘠民贫，洋货无处销售，法人进入将无立足之地

中英《烟台条约》已经签订 5 年，云南百姓终岁衣食不给，鲜有商品交换，英人无利可图，终未前来通商。法国也不例外，“纵许其通商，亦不能安设马（码）头”。^[18]

第四，滇越交通不便，开放云南无碍国家安全

云南与越南之间，山险丛杂，瘴疫繁兴，界上又有滇军和黑旗军

[14] 郭嵩焘：《郭侍郎奏疏》卷 12，页 32。

[15] 湖南人民出版社校点：《郭嵩焘日记》卷 4，页 275。明江，自越南流经中国广西宁明～上思一段河流之名；富良江，即越南境内的红河，亦称“红江”。

[16] 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 4，页 17。

[17] 薛福成：《庸庵文编》卷 2，页 41。

[18]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 3，页 23。

分守，法国的军事势力不可能趁通商之机染指云南。至于滇越水上通道——红江，水浅滩多，兵轮不便行驶，法国决不会因此用兵滇疆。故“以地形吃重而论，权衡夷险，似乎西鄙关外更于滇边也。”^[19]

从上看出，真正能说明开放云南理由的仅有前两条，而后两条仅从反面证明开放云南无害。由于开放派考虑问题的前提条件、后果、目的不完全一致，造成了他们所陈述的理由互相抵牾，如冀收通商之利者理所当然要以道路畅通、双方有交往的可能性为先决条件，但这个条件恰好被他们当中的另一部分人否定了，利从何来，再也无人深入探究。

2. 反对派及其观点

反对派从人数上看，可谓队伍庞大，阵容强盛，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他们的代表。早在曾纪泽主张开放红江之前，他们就频繁活动，接二连三上书反对开放滇岸。曾纪泽的建议传开后，翁同龢立即表态：“兵亦当进，商亦当通，总须持定红江口岸不入滇境。”^[20]从都察院御史张佩纶、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德润、章京李国琇到前两江总督刘坤一、前福建巡抚丁日昌以及滇、粤边境的督抚大吏等等，多不同意任由法人入滇。尤其是云贵总督岑毓英，他称阻止外人入境为“滇之幸”。^[21]

反对派反对法人入滇通商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维护国体，消除隐患

如果屈从于法国的恫吓而开放云南通商口岸，不但示弱于人，有伤国体，而且法人将得寸进尺，窥例占据，隐患无穷。要是其他列强从而效尤，不可能屡开口岸以填其无厌之欲壑。所以，振国家之威严，

[19] 曾国荃：《曾忠襄公全集》书札卷16，页34。

[20] 《中法战争资料》册2，页1。

[21]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册，页27。

堵列强之口实，必须禁止法人入滇。

第二，保护云南矿产资源

由于云南矿产丰富，“外夷屡欲通商，大都垂涎于此。”^[22] 法国占领越南后，曾派人入滇探测矿脉，企图寻机开采。于是，通商便成了入滇采矿的借口，此即所谓“阳通滇商，阴覬矿利也。”^[23]

第三，防止法人以云南作跳板，向长江流域扩展势力

法国要求通商的最终目的乃是“循江而上，窥我云南”，^[24] “窥滇与蜀、楚之道路”。^[25] 这样，法国就能占领西南，沟通江汉，据泰西诸国通商口岸之上游，攫取更大的利益。法国的这一阴谋诡计不可不防。

为了有效地阻扼法人入滇，反对派认为不能光靠舆论的威力，更重要的是拿出具体的抵御办法。他们当中有的建议清廷令滇省督、抚速于保胜上游预为设法堵截，以杜奸谋。有的主张加重由越入滇的货税，使法人无利可图而不敢前来。经过争论，反对派一般倾向于緘口不开滇边，或用其他理由在形式上表示开放来掩盖实际上的关闭。

由于反对派多方活动的影响，上下臣工越来越多地趋向并赞成、拥护他们的见解，形成了论争中的优势。但是，这类论争毕竟不能用举手表决的形式得出结果。当时国际环境的骤变和复杂、清政府内部矛盾重重及其对法政策的妥协性，致使这次论争迟而未决。

3. 为何无人执牛耳

考察这场马拉松式争论的自始至终，谁也没有说服谁。造成这种长期争执没有结果的原因，大致有如下诸点：

[22]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2，页3。

[23]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下称《洋务运动资料》）册7，页18。

[24] 张佩纶：《涧于集》奏议卷2，页28。

[25] 唐景崧：《请缨日记》卷1，页3。

（1）对列强的本质及其要求通商的目的认识不一致

开放派多认为洋人通情达理，持平守信，对中国没有仇恨之心。因此，他们把开放云南看成单纯的通商问题，“西洋立国，专务通商，其兵愈强而愈不轻言战。”^[26]与此相反，反对派普遍认为洋人惟利是嗜，无信义之可言，其要求通滇，是为了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拊楚、蜀之背而兴江海之戎”。^[27]这一认识上的差异，不特存在于中法战争爆发前，而且贯穿于整个近代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法战争恰恰处在中国近代史的中期，这种认识不同的存在，并不奇怪。

（2）论争者时而回避对方的论题，使论争缺乏针对性

这次争论中，论争者不从正面反驳自己不同意的观点。例如，反对派深忧洋人掠夺云南的矿产资源，开放派则要么闭口不提矿藏问题，要么不把矿产权与通商联系起来；而开放派所说云南地瘠民贫，洋人无法在滇站稳脚跟，反对派既未否定这个事实，反而沿袭此说，并把它当作民间无须通商的前提。如此无的放矢的争论，只能徒费口舌。

（3）双方未能对实际情况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各自的理由得不到证实

这一点以红江是否能通船说法不一表露最为充分。在当时滇越交界处山路交通不便的情况下，红江能行舟与否是云南可否通商的一个重要条件。但这个条件是否存在，官僚们不但没有亲自考察，就连法国的探险结果也鲜为人所注意，他们只凭所能阅读到的禀文、奏章来下结论，当然难以令人信服。这样，争论无休止地延续是不可避免的。两种意见长期争辩，实际问题得不到真正解决，也耗费了清朝防边备战的大好时光，同时它反过来激化了日益紧张的中国对外关系，使看

[26] 《郭侍郎奏疏》卷12，页44。

[27] 刘长佑：《刘武慎公遗书》奏稿卷21，页17。